

##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农业恐慌及其启示 ——主要基于《日本评论》中国学者文献的考察

李博强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 日本发生了规模空前且诱因复杂的农业恐慌。周一和、钱芝君、谭振民等中国学者相继在《日本评论》发表论作, 就农业恐慌形成的原因及影响进行考察与分析。他们认为, 日本农业恐慌的诱因复杂, 既有农民负债过重与农产品价格下跌的经济因素, 也有长期以都市为中心的行政积弊, 以及资本主义压榨与剥削的制度因素。虽然日本政府在农民运动压力下制定了一些农业救济政策, 但是根本不能解决现实的农业恐慌, 农民运动和农民斗争频发, 农民、农村在恐慌中走向破产与混乱, 并逐渐走上法西斯的道路。

**关 键 词:** 日本; 农业恐慌; 诱因; 社会影响; 中国学者; 《日本评论》

中图分类号: K1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3)06-0066-07

### Japanese agricultural panic in the 1930s and its enlightenment: Mainly based on the articles written by Chinese scholars issued in *Comments of Japan*

LI Bo-qiang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30s, an unprecedented agricultural panic took place in Japan and the cause of it was complex. Chinese scholars like Zhou Yihe, Qian Zhijun and Tan Zhenmin published articles on the agricultural panic in the *Comments of Japan* in succession,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anic and affect. They thought that the cause of Japanese agricultural panic was complex, which included the farmers' heavy burden, low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ices 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Althoug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some agricultural relief policy under pressure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but the real panic of agriculture cannot be solved, the peasant movement and peasant struggle were frequent, the farmers and the countryside went bankruptcy in panic and confusion, and Japan also gradually went on the path of fascism.

**Key words:** Japan; agricultural panic; cause; social influence; Chinese scholars; *Comments of Japan*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 日本农村社会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且诱因复杂的农业恐慌。这场恐慌始于 1929 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 此后一直不断恶化, 日本农村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农民破产陷入极端贫困, 农民斗争不断发生。此次农业恐慌不仅是日本农村经济危机的总爆发, 而且是日本走向法西斯道路的重要推动因

素, 因此在探讨近代日本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中, 20 世纪 30 年代的农业恐慌是必须重视的问题之一。《日本评论》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学者创办的研究日本社会的专业性学术期刊, 其中刊发了大量关于日本农村社会的研究文章。当时, 以周一和、钱芝君、谭振民等人为代表, 相继在《日本评论》中发表论作, 就日本农业恐慌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考察与分析。笔者拟以《日本评论》中国学者的文献作为基本史料, 着重探究日本农业恐慌爆发及其诱因与破坏性。

收稿日期: 2013 - 11 - 07

作者简介: 李博强(1985—), 男, 内蒙古赤峰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近代中日关系史。

## 一、日本农业恐慌及其表现

1929 年由美国开始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到日本,使本已在萧条状态挣扎中的日本经济全面恶化,尤其是农业经济雪上加霜,导致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农业恐慌爆发。农业恐慌具体表现为:农产品价格持续狂跌,地价低落,农产品输出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村负债和失业人数增加,农民陷入极端贫困化等等。<sup>[1]</sup>

日本的经济危机首先从商品和股票市场开始,商品和股票的价格暴跌,1930 年的批发物价比 1929 年跌落了 18%,1931 年比 1929 年跌落了 30% 以上。<sup>[2]</sup>其中,农产品以生丝和棉纱的商品价格下跌趋势最为明显,1929 年 12 月,生丝每 100 斤交易价格为 1 171 元,到了 1931 年 6 月,仅有 527 元,价格下跌了 50% 左右,棉花在同一时期也下跌了 30% 左右。<sup>[3]</sup>而更为严酷的是,日本的主要农产品大米和蚕茧的价格也同样在大幅度下降,1930 年 4 月,米价每石为 26.91 元,1930 年 12 月下降到 17.7 元。虽然 1930 年大米丰收,但因米价猛跌,反而造成丰年饥馑的局面。1929 年春茧每贯(3.75 公斤)为 7.57 元,1930 年跌至 4 元,1931 年跌至 3.08 元,<sup>[4]</sup>使得占日本农户 40% 的养蚕户遭到严重损失。然而,与农产品价格降低相反,肥料以及其他的农业工业品价格,由于垄断资本限制生产和协定价格,并未下降多少,从而扩大了农民贱卖贵买的剪刀差,加之农民负债不断增加,全国农家的负债总额,从 1929 年的 40 亿元剧增到 1931 年的 60 亿元,农民每户负债达 1 000 元,<sup>[5]</sup>进一步增加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压力。1930 年对农村总收入的估计表明:养蚕收入 1930 年比 1925—1929 年五年平均减少 3.174 亿元,大米收入减少 7.829 亿元,其他农产品收入减少 5.608 亿元,总计减少 16.611 亿元,即减少 40% 以上。<sup>[6]</sup>1931 年,以北海道等地为中心,稻谷因冻灾而遭受大歉收,1933 年,三陆地区遭受海啸,1934 年,室户台风导致日本关西地区遭受严重风灾、水灾,<sup>[5]</sup>日本农业恐慌更加严重。

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极速下跌,日本农村经济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农民纷纷破产,农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日本传统的农村经济开始瓦解。根据当

时日本政府的农村调查,农民生活的悲惨境地可以从其调查的文字中得以知悉。根据新潟县的村事务次官调查:“新潟县米的收入,占日本全国米产量的八九成,所以平常米行市若腾贵一些,农民就欢天喜地了,可是现在可出卖的米,一粒也没有了。只好卖了女儿去维持生活,二十岁的女子农村中已渐渐地少下去,因为都已卖给都市去做娼妓了,二十岁左右的女子,卖价自百元至四百元不等,要以面貌之好恶而定。甚至这样农民也无饭可吃,如北蒲原,中蒲原及鱼沼郡等地方,农民普通所吃的就是肥料的豆粕和粟麦。”<sup>[7]</sup>而岩手县的情况与新潟县也基本类似,“……最可怜的,贫农因无钱还债,只好卖了女儿,或使女儿做娼妓,所以二十岁以上的女子,可说已经没有了。……蕨薇已是上等的食物,现在也找不到了,普通都煮肥料和青草调和起来,作为日常的便饭。”<sup>[7]</sup>长崎县的事务次官谈到调查农村社会时,认为“到处都是为贫穷而烦闷又烦闷的町村,一二月来,在这个地方的农村里,米、糖、酱油、盐等日常用品的偷窃盛行,使警察很感棘手。要在农村看到五角钱的现银,简直是不容易的事情。至于食物,有麦嚼,要算是最上等的了,一般人都争食着山间的野菜野果。所以能结果实的树木,极为人所珍贵。”<sup>[8]</sup>而在山形县小国村的一家为生活为债务租税所迫,卖完了他们所有的女儿,使他们的每个亲生女儿都蹈入人间地狱,可是,他们还不能停付税金和利息。<sup>[8]</sup>基于以上材料,可以清晰地了解当时日本农业恐慌及其所导致的农民悲惨的生活状况。

## 二、日本农业恐慌的主要诱因

针对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农业恐慌爆发的原因,周一和、那须皓、钱芝君与谭振民等人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相关分析。周一和从单纯的经济角度出发,分析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农民在经济上的负担日益严重,逐步走向破产促使农业恐慌爆发。那须皓将日本农业恐慌的爆发归结于远因与近因的结合,他认为只有从日本社会长期的政治、经济积弊中寻找原因,才能接近恐慌发生的本相。钱芝君与谭振民在探讨日本农业恐慌中,充分揭示了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无法摆脱生产

“相对过剩”这一基本矛盾，农村经济必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遭受压榨而日益凋敝，农产品的相对过剩与农民的极端贫困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扭转的症结，必然导致农业恐慌的爆发。

### 1. 经济因素：负债过重与价格下跌

周一和在探讨日本农业恐慌爆发的原因时提出农民负债过重、农产品价格下跌是最为主要的因素。他认为：“由‘庄园’里出来的日本农民，赤身裸体除转入工场做工以外，不得不举债去经营农业。所以日本农民的举债谋生，是封建余制的所赐。那时候，工商业犹未发达，金融犹未集中于都市，农民举债甚易，而且利息亦甚微薄，故农民甚乐利用债款，去从事发展其事业。”<sup>[7]</sup>但是，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金融商业的完善，农民的负债随之日益增加。同时，农民在种植米谷与生丝时，“每因丰作时，米谷落价，得不偿失。生丝业发达，农民遂纷纷毁其田园，以种植蚕桑，数年后，其桑园茂盛时，丝价已崩落了，复不得不毁其桑园以种植稻米，而米价又落。历数次改业经营结果毫无所得，反而负了一身债务。”<sup>[7]</sup>30年代初期，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1929年到1930年间，日本农民负债总额高达4.5亿日元，其中欠私人方面的债务，占全数的56%以上，<sup>[9]</sup>私人借款的利息，多半都以高利贷为主，农民的收入不仅不能还本，就连利息也无法偿还，逼得农民又不得不借新债，农民债台高筑，便永陷于不能自拔的窘境了。而且，农民每年还要承担捐税的重压。日本农业每年所负捐税的数额如下：自耕农每家负担181元，自耕农兼佃农每家负担89.8元，佃农每家负担30.3元。平均每家负担三倍于工商业者的负担，当此农村破产之时，日本农村的收入，差不多以十分之七八，都要去缴纳捐税。<sup>[7]</sup>与此同时，周一和认为农产品价格下跌也是农村恐慌的重要因素。日本农产品以米谷和生丝为大宗，农民每年的收入，全赖这两项支持。“日本的米价，虽则因年成丰歉的不同，时有变化，然就大体而论，逐年仍是增加的。”<sup>[7]</sup>1929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日本滨口内阁政府实行金融解禁紧缩政策，导致商品价格暴跌，而此年粮食丰产，超出本国需求，米价由每石28元跌至14元左右。根据日本政府调查，当时米每石的生产费需要

21.3元，农民不仅无钱可赚，甚至还要亏本7元左右，朝鲜和台湾的米像潮水一样涌入日本，使得日本大米滞销，农民大量破产。生丝的价格也与米谷的价格一样，遭遇前所未有的下跌潮，日本生产的生丝多以销往美国为主，“然美国近来因不景气的影响，消费力大减，据去年(1931年)美国丝业协会的报告，1929年1月生丝的购买力是2.6亿元，去年同期减至1.4亿元，殆减少了一半，因之日本的生丝就暴跌至每贯2元左右，而且丝积如山，无人顾问。”<sup>[7]</sup>当时日本约40%农民都从事种蚕养桑业，处境可想而知。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不景气的旋风，冲破日本资本主义的壁垒，大小工场相继破产关门，兼以拥护资本家的滨口内阁，厉行产业合理化紧缩政策的结果，失业工人激增，根据日本《劳动杂志》的统计，30年代初期，日本的失业者至少已有一百五十万人”，<sup>[7]</sup>而这些失业者中，大多数都是农民，许多农民因为失业，不得不回到农村中去，而已濒临破产的农村经济也无法供养失业者，结果更加剧了农村恐慌。

### 2. 社会因素：以都市为中心的行政积弊

那须皓认为日本农业恐慌的发生在于近因与远因的结合，周一和所分析的结论只是近因而已，这是造成30年代初期日本农业恐慌的具体原因，但是，日本农业恐慌不仅在30年代发生过，在这之前实际就已多次发生，尤其以1918年日本的“米骚动”为规模最大。因此，从日本社会长期的政治、经济积弊中寻找原因，才能接近恐慌发生的本相。那须皓指出：“日本农村恐慌的远因，或者说是深层次原因在于多年以都市为中心的一般行政积弊。即在农业及农村的牺牲上，供给商工业及都市繁荣与便利的经济组织及经济政策。农业者与有同样所得的商工业者比较起来，他们要负担二倍以上的赋税，这乃是二十年前已存在的事实。”<sup>[10]</sup>日本持续数十年的以都市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使日本农民承受巨大的剪刀差，不仅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更加剧了都市与农村的落差，农民日益贫困。“储蓄存款及保险等所用的金钱，大部分集中于都市，给予都市企业以较大的便利，关于教育、医药及各种教养机会等，农民如想与市民并驾齐驱，不得不增加更多的支出。”<sup>[10]</sup>那须皓认为过度的中央

集权化必然造成官吏的冗员，行政费的开支浩大，巨大的国家支出多半用于去救济或保护有特权的公司、银行。因此，必然忽视负担沉重的农民，致使农村经济日益贫困。“一言以蔽之，现在日本的农村，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的一切因为过于都会中心化，所以不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很久都是受到持续的榨取和压迫的。所谓农村这一棵繁茂的大树，好久便被看不见的都会之光的蛀虫所蚀。一朝摧折这颗大树，不难想象到这颗树下的文化住宅——都市的命运也要变成废物。”<sup>[10]</sup>

### 3. 制度因素：资本主义的压榨与剥削

钱芝君在考察日本农业恐慌的真相中指出，所谓的经济与社会原因只是皮相之谈，农业恐慌的根本原因不在个人，而在于制度，“屈服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及资本主义的政治机构之下的日本农村，当然会遭遇这样的厄运。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筑在农村的榨取之上的。资本家一方面任意榨取，以图自己的私利，同时阻止了农村的发展，促成农村的疲敝。日本是零细农业制，这种榨取关系，特别强烈，所以日本的农村，渐趋衰颓。”<sup>[8]</sup>钱芝君认为，日本的资本家在遭遇经济危机时，时时刻刻都在维护自身利益，不顾农民的死活，“他们为自身的利益起见，命令他们的御用政府实施金解禁政策。而金解禁的政策，自然对金融资本家有利，而大不利于农村。”<sup>[8]</sup>由于日本政府实行金解禁政策，导致物价极速下跌，外汇价格高涨，都市产业合理化的政策致使工人大量失业，许多工人回到农村，加剧了农村恐慌情绪。谭振民也同样指出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是日本农业恐慌爆发的根本原因。“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筑在农村榨取之上的，详细的说，资本主义由于地租税、地租、商工资本、金融资本等榨取。一方面，用以养成自己的肥大；另一方面，却阻止农村的发展，更促进其极度凋敝。这种榨取关系，在日本的小农体制之下，尤其是强烈地实现出来。因此，日本的农村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连年走向凋敝。”<sup>[11]</sup>在这种慢性恐慌影响下的日本农村，突遭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自身的恐慌情绪。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商品过剩成为当时日本农业恐慌的重要诱因，一些政治家提出商品过剩导致日本农产品滞

销，农村经济破产。但是，谭振民指出日本农业商品不仅没有过剩，反而在 30 年代初期略显不足。谭振民指出：“所谓过剩，是生产物因大众购买力的激减而生之相对的供给增加。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的经济恐慌有一个极显著的矛盾现象，即一方面商品的生产供给发生巨量的过剩，而另一方面社会的劳动大众陷于饥饿困苦的状态”，<sup>[11]</sup>日本的农业恐慌就是这一理论的最好例证。1930 年，日本大米因为丰年的关系，总体供应有所增加，根据日本政府统计拥有 9 531 千石的过剩。但是就日本全国米的消费量 7 100 万石来说，日本国内收获的米谷 6 500 万石是不可能满足国内需要的。而且，日本政府以每人消费一石一斗一升四合来作统计，完全是不符合实际的。仅 1921 年，日本每人消费就已达一石一斗五升，且这样的消费还不能满足温饱，如果以每人消费一石一斗一升四合是根本罔顾百姓死活。朝鲜米与台湾米的输入似乎成为日本国内米谷过剩的元凶，实际上根据谭振民的计算，“朝鲜米的收获量约有两千万石，若认为朝鲜人大众也有和日本人每人所需的贫弱消费量（一石一斗一升）相同的消费必要，则朝鲜人的必要消费量当达到二千二百万石以上，于是，也会出现不足。”<sup>[11]</sup>这样就不可能有更多的朝鲜米输入。谭振民最后总结资本主义危机下的过剩，就是“因为无论在国内或在殖民地，被榨取者的勤劳大众，对于生活上必要的米量，没有购买力的缘故，所以，一方面有广泛的劳动者大众之饥饿，而同时，另一方面，在内地，在殖民地，又都有广泛的农民大众急欲获得现金，而将来出卖，他们所得的，不但不能偿抵资本，即连自己的工钱，都不能收回。换言之，即在另一方面，有广泛的食物生产者大众濒临饥饿。这是何等矛盾的一个事情！这便是‘米过剩’的真正原因。”<sup>[11]</sup>

### 三、日本农业恐慌的社会影响

面对日益严重的农业恐慌局面，日本政府开始研究各种对策以避免造成农民暴动和政局动荡。当时，日本内部的各政党纷纷提出各种解决对策，这些政党基于本阶级利益出发，只是希望通过一些对策舒缓农业恐慌所带来的危机，因此这一时期的政府对策根本不能解决农业恐慌。当时，主张农村救

济最为卖力的是“劳动党”和“大众党”。他们多次向政府与议会提出各种救济方案。其中，“大众党”的解决方案主要包括：“农民的借金、税金及田租五年间全数停付，肥料与种子由国家无偿配给，产米与养蚕农家的损失由政府补偿，禁止干涉与收回土地，强制命令付给工人未付的工资。”<sup>[7]</sup>“劳动党”的提议与“大众党”大同小异，不过增加了要求政府所有米免价配给农民，开放国有森林，即时开放农村救济事业等条款。以上各政党的提案，实际都要求政府运用国库资金救济农民来缓解农业恐慌，但是面临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日本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解决农民问题呢？根据当时日本大藏省统计：1931—1932年度，日本国库岁入为十二亿四千万日元，岁出为十三亿六千万日元，岁入不足一亿八千二百万日元，<sup>[7]</sup>出现明显的财政赤字，而现在又要支付农业救济资金，对于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说是无法办到的。因此，以上各种决议案“都是实际上不能实行的乌托邦，除表面上骗得农民同情之外，农民一点也得不到好处”。<sup>[7]</sup>然而，面临庞大的农民请愿运动甚至农民斗争，日本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来缓解这些危机。因此，当时日本内阁的农林、大藏、内务、铁道及陆军等大臣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最终制订了农业恐慌的救济政策。这一救济政策主要内容包括：“1、为救济农村，农林与内务两省于可能范围内融通预金部资金，以发展土木和其它事业；2、本年度农民应偿之低利资金八千万日元，延长其偿还期，但征收其利息二千万日元；3、对于重要农产品即米谷及蚕丝，统制其生产与贩卖；4、关于农家肥料之资金，请求适当的手段；5、关于公租、公课的精简，请求可能之方针，由此而生之国库收入减少，再由别途抽出财源补充之；6、为扩充产业组合的金融机能，行适当的制度改正。”<sup>[7]</sup>这一农业救济政策随后由政府颁布实施，但实际上其根本不能解决其时的农业恐慌问题。首先，日本政府当时资金困乏，本身背有近七亿元的公债，同时又负有近一亿八千二百万日元的赤字，根本无力抽取资金来接济农民，因此融通资金之说就是无法兑现的政策；其次，政府虽然免去了农民应偿之低利资本，但是又要求必须偿还利息二千万日元，试想当时农民生活困苦的状态，二千万日元

的利息农民又怎么可能完全负担呢？再次，当时日本政府背负巨额公债，如果再加上数亿元的农村救济公债，日本政府不仅无法偿还，甚至还会走向破产，因此政府提出在别途抽出财源补充之是画饼充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质而言之，日本政府虽然迫于压力制定出农业救济政策，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解决农业恐慌的问题，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日本政治、经济之积弊。最终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逐步走向法西斯化，农民、农村也被束缚在法西斯的车轮上，在危机中走向破产与混乱。

日本政府的农业救济措施及政策不仅没有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反而加剧了政局动荡，农民运动频发。许多农民云集东京，向政府和议会请愿，组织农民协会，甚至部分地区爆发农民斗争，根据统计，1929年日本的佃农斗争为2434次，1930年为2478次，1931年为3419次。<sup>[12]</sup>

为维护自身利益，日本农民首先成立农民协会，并发动农民向政府与议会请愿，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农民协会为自治农民协会和各农民代表联合会。自治农民协会是日本农民运动右翼团体“农本联盟”的分会，此次的请愿运动即是由该会首先提出，并派出代表长野郎、稻村隆一与和合恒男等，在东京各方面进行直接活动，接连向议会提出请愿书数万份，引起当时日本社会人士的注意。之后，各地的农民应声而起，纷纷参加请愿运动，地区多达十七个县之多，当时日本农民运动的呼声，震动日本全国。<sup>[13]</sup>日本全国的农民团体到达东京后，为使运动更为有效，各农民团体联合组织成立各农民代表联合会。该联合会向政府与议会提出请愿书，直接研究救济农村的对策，在向政府提出请愿书的过程中，联合会制定了一系列决议，要求政府执行。<sup>[7]</sup>首先，联合会要求政府解决农民负债问题。提出政府金融机关的低利借款，延缓三年后偿还；政府融通多额低利借款给农民，以减少农民的私人高利借款；政府低利借款的手续简易化，无担保借给农民。其次，要求维持农产品的价格。联合会提出改正米谷法，以米谷生产费作基础，定最低价格；改正米谷需给调节特别会计法，提高证券及借入金最高定额，必要时农民可超最高定额向政府支借；限制殖民地米的输入。对于蚕茧的销售，由政府负责，限制夏秋

茧的产量,调节市场价格。<sup>[7]</sup>各地农民代表不仅向政府及议会请愿,同时还请联队区司令官上奏天皇请愿。各地农民代表联络农村出身的士兵,每联队区组织一团体,要求区司令官呈请陆军大臣,直接奏请天皇接济。周一和针对当时日本的农民运动指出:“日本的农民现在已怒号起来了,所以还迟迟未忍运动干戈者,犹希望政府与资本家最后之慈悲救济而已。现在他们已提交最后通牒给政府了,政府若没有满意的回答和救济,我可断言一句,他们的暴动马上就要发生了。”<sup>[7]</sup>

#### 四、日本农业恐慌的启示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农业经济造成重创。究其根本,日本的农业恐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日本社会长期的政治、经济积弊所导致。钱芝君、谭振民等学者在探究日本农业恐慌时,都关注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日本农村经济的剥削压榨,从而更为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农村经济长期萧条的原因。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近代国家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然而,由于日本国土狭小、自然资源不足等因素的限制,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工业化的过程中受到资金、能源不足的掣肘。此时,日本的农村经济便成为日本工业经济的哺育者。农村的原料、资金大量进入城市,流向工业,造成工业与农业发展的严重失衡,“工业资本主义急速地高度发展和农业资本主义缓慢地低度发展,成为日本资本主义根本性的、致命性的矛盾”。<sup>[6]</sup>农村经济长期处于被压榨的地位,未能得到工业的反哺,最终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村经济破产。日本的农业恐慌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长期忽视农业与工业平衡的恶果,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但是仍然保留了大量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残余,日本农村经济最为典型。日本的农村经济虽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一环,但是其发展程度仍然保留了小农经济与地主土地所有制。小农经济与地主土地所有制依附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断通过佃租等形式压榨日本农民,导致日本农民长期

承受高额的公课租税,“地力干涸,种种榨取,使农民日益贫困化,这些事情,使农业资本之正常时再生产进程陷于不可能,非在重压之下,继续进行农业生产不可”。<sup>[11]</sup>而且,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这种榨取和压迫更加强烈化。另外,日本农村阶级的分化日趋明显。居于农村上层的地主、富农和上层中农不断扩大自身的经营面积,从而使“中农、属于下层及贫农层的自耕农和自耕兼佃农,大多要被并夺土地,而逐渐化为佃农了”。<sup>[11]</sup>由于农村阶级愈加细分化的倾向,“贫农—佃农并农业者普罗拉搭利亚(无产阶级化)增大的倾向将要极速发展了。”<sup>[11]</sup>随着经济危机的冲击与农业恐慌的蔓延,地主、富农阶级必然将危机、负担转嫁于佃农,农村阶级的对立更加激化,农民运动、农民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扩大了农业恐慌的危机。

综观上述,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日本的农业恐慌是日本农村问题最为严重的时期,也是中国学者关注与研究日本农村问题最为集中的时期。以周一和、钱芝君、谭振民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相继在《日本评论》中发表论作,考察日本农业恐慌的原因及影响。中国学人在关注中国自身农业问题之时,也将眼光聚焦于日本,通过解读日本农业恐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 注释:

- ① “农业恐慌”这一概念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日学界针对日本农业危机的一种特定称谓。当时针对日本农业恐慌的界定主要有: 姜离斋认为:“所谓农业恐慌者,就是农产品的生产量超过社会的需求,致价值低落;而农民经年辛苦,无利可图,濒于破产。”(姜丽斋:《世界农业恐慌的概观》,《东方杂志》,1932 年第 29 卷第 7 期);谭振民指出日本“农业恐慌的原因,无疑的,是在于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地引起尖锐的急性的经济危机。”(谭振民:《日本农业恐慌的考察》,《日本评论》,第 1 卷第 2 期);河西太一郎认为:“恐慌乃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必然发生的现象,它的根本原因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生产力与消费力的不均衡发展。”(河西太一郎:《农业恐慌形态论》,《现代司法》,1931 年第 1 卷第 1 期)。
- ② 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日本农业恐慌的研究,现在尚关注不多,其中庞宝庆:《论“昭和恐慌”中的农村危机》对日本农业恐慌及日本走向法西斯道路进行了研究。其它对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日本经济危机研究的论作主要有:张经纬:《对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日本经

济危机的再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  
李东芝:《昭和动乱动因探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第5期;郝宏桂:《日本现代化的失衡与法西斯  
主义的兴起》,《盐城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庞宝庆:《论“昭和恐慌”中的金融政策》,《渤海大学  
学报》,2012年第3期。

③ 日本流通货币称为日元,或日圆(円),本文在此简称为元。

#### 参考文献:

- [1] 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M].上海:中国研究书店,1936:157-158.
- [2] 金井则义.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M].日本:合同出版社,1963:134.
- [3] 梶西光速.日本资本主义的没落:第2卷[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4:364.
- [4] 大岛清.日本经济危机史论(下卷)[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57:363.
- [5] 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9,38.

- [6] 庞宝庆.日本昭和恐慌中的农村危机[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8(4):85,87.
- [7] 周一和.日本之农村恐慌与其救济策[J].日本评论,1932(2):64,61,62,63,67,68,65,66.
- [8] 钱芝君.日本农村经济恐慌的真相[J].日本评论,1932(4):109,110.
- [9] 张觉人.日本农民负债之现状与其整理[J].日本评论,1937(3):29.
- [10] 那须皓.暴风雨中日本农村——原因及其对策的检讨[J].日本评论,1932(2):72.
- [11] 谭振民.日本农业恐慌的考察[J].日本评论,1932(2):40,52,53,54,57.
- [12] 大岛清.日本农民运动史[M].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1961:256.
- [13] 储醉醒.日本租佃问题概述[J].留东学报,1932(4):33.

责任编辑:曾凡盛

(上接第65页)

第三,继续深化和推进中、西部地区养老及医疗等关乎老人保障领域的改革,降低老年人对生活的不确定性预期,以提高中、西部地区老年人的乳制品自主消费水平;另外,应继续推行“学生饮用奶”计划,尤其是西部地区“学生饮用奶”计划。

第四,提高各地区奶牛养殖的集约化水平和效率,降低原料奶的成本,同时完善原料奶价格形成机制,维持乳制品价格稳定,以此来提高居民的乳制品消费水平。

第五,虽然在本文中并没有讨论乳制品质量安全对乳制品消费的影响,但是随着乳制品质量安全事件的不断发生,人们更关心乳制品的质量安全,所以政府和乳制品企业应当增强食品质量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保障乳制品质量安全。

#### 参考文献:

- [1] 赵志华,岳田利,王燕妮.乳制品的营养价值及发展

前景[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5(11):18-20.

- [2] 程国强.中国乳业:生产、消费、贸易与国际化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1(2):137-148.
- [3] 程瑞红.中国乳品消费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6:17-18.
- [4] 徐世卫.中国奶业消费特征与消费量预测[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9(12):4-7.
- [5] 张莉侠,孟令杰.中国城镇居民乳品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7,26(2):125-128.
- [6] 刘锐,王莉.中国乳品消费及影响因素研究[J].农业展望,2013(3):71-75.
- [7] 伏浩.中国乳品消费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3:12-13.
- [8] 尹宗成,张士云,李冬崑.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分析[J].消费经济,2009,25(2):27-30.
- [9] 李通屏,程胜,倪琳,等.中国城镇化的消费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3(3):19-27.

责任编辑:李东辉